

打开草木金石的奇妙世界

吕晓东



吕晓东 辽宁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胸中有诗书就很有气质和才华，这种气质不仅表现在外表，更涵盖内心的修为和境界。作为医生，经常面对患者的病痛，需要不断琢磨怎么治好病；作为老师，要把本事传给学生，得自己先学扎实。这些年来，我觉得读书就是最好的“充电”方式。从《本草纲目》的草木世界，到《伤寒论》的辨证殿堂，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烈火淬炼，到《平凡的世界》的泥土扎根，每一部作品都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留下深刻印记。这些书籍早已不再是书架上的陈列品，而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

青少年时期的每个夏日午后，我总会趴在老书房的藤椅上，捧着那本泛黄的《本草纲目》发呆。书页间工整的木刻图

谱里，人参的虬曲根茎、灵芝的云纹菌盖、穿山甲的鳞甲排列，都像被赋予了神秘的生命力。那时的我尚不知“君臣佐使”的配伍之道，却被“诸药所生，皆有境界”的文字深深吸引——原来一草一木的生长，竟暗合天地四时的规律；一味药的性味归经，早已写进它的形色肌理。这段与《本草纲目》初遇的经历，在我的心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中医药的世界，该是怎样一个草木含情、金石有灵的奇妙天地？

随着阅读深入，我渐渐发现这部书于明万历年间的巨著，不仅是药物学的百科全书，更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书中收录的1892种药物，11096则处方，上自宫廷御方，下至民间偏方，每一味药的背后都藏着医者仁心。比如“青蒿治疟”的记载，历经千年后启发屠呦呦团队提取青蒿素，挽救千万生命。这些穿越时空的医学智慧让我明白：中医药的传承，从来都是在典籍研读与临床实践中架起桥梁，而《本草纲目》，正是我踏上这座桥梁的第一级台阶。

1983年考入辽宁中医药学院的那个秋天，成为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第一堂课，老师带领我们齐声诵读《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琅琅书声在教室里回荡，窗外的银杏叶正簌簌落下，仿佛在为这段跨越千年的医者誓言作注脚。从那时起，“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的仁心，便与“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求知

欲，一同刻进了我的职业信仰。

在大学的日子里，中医经典成为每日的必修课。清晨的图书馆前便排起背诵《药性赋》的长队；深夜自习室，总有人对着《伤寒论》的条文蹙眉苦思。经典的魅力正在于其穿越时空的精准——千年前的“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至今仍是外感寒表虚证的治疗准则；“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未病思想，更是现代亚健康调理的重要指导。

走上临床岗位后，我愈发体会到老中医们常说的“读经典如晤名医”——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先贤的智慧，早已化作无数临床案例，在典籍中等待后世医者的发掘。

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记忆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被无数次翻阅、无数次抄写的精神图谱。泛黄的书页间，保尔·柯察金的那句独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曾被我们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扉页，贴在课桌右上角，甚至刻进青春的坐标轴。

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大学宿舍的铁架床上。那时的我尚不懂得生活的艰辛，直到临床实习时，亲眼看见老师在连续做了多台手术后，靠在值班室墙上吃冷掉的饭菜；看见老教授拖着患关节炎的腿，坚持每周出诊三次，才明白原来现实中的

“钢铁”，正是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磨砺中锻造而成。这种精神，后来也成为我指导学生时反复强调的信念——当医生，就要有“把苦难嚼碎了咽下去，再化作前行力量”的觉悟。

如果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团燃烧的烈焰，那么《平凡的世界》便是一方深厚的黄土地，沉默却饱含养分。我跟着孙少安在双水村的田埂上奔跑，看他因为贫困不得不辍学，却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办起砖厂；跟着孙少平走进大亚湾煤矿，感受他在漆黑的矿井下借矿灯读书的孤独与坚定。那些浸透了汗水与泪水的文字，让我第一次读懂“平凡”与“伟大”的辩证关系：真正的伟大，往往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作为中医人，望闻问切的细致、辨证开方的审慎，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实则是对“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誓言的无声践行。

从少年时的懵懂求知，到中年时的职业坚守，阅读始终是我精神世界的灯塔。它让我在中医药的浩瀚海洋中找到航向，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保持定力。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而文学的光芒，终将照亮每一个认真阅读、用心生活的人。

（制图 董昌秋）



辽宁省第十四届全民读书节特别报道

屈原的纠结和抉择

——端午重读《远游》

顾 农

《远游》是屈原的重要作品，写他政治事业失败以后内心十分痛苦，希望远游天国，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诗的开头说自己下决心离开这可怕的现实世界而神游天上：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步徒倚而遥思兮，招惆惋而乖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

在天国，诗人与赤松子、傅说、韩终、王乔等神仙相往还，非常高兴，但他仍不关心神不定，最后他结束了这次远行，另选一个完全无为的哲理性世界来安身立命，经营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

看来屈原对神仙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真正关心的还是他的祖国。不过这一点在诗里没有说得很分明，《远游》中段有些字句很容易令人想起《离骚》的结尾，但内涵很不同，在这里他结束远游放弃神仙返回只是他寻找归宿途中一个片段：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娱娱以自乐。涉青云以汎

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汜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

据原文可知诗人告别天上的神仙以后是另寻泰初无为之地来安顿自己，这其实还是一种空想。后来到《离骚》里屈原才明确地说只有在楚国实现“美政”的理想才是他念念不忘的根本心事，于是就不谈什么虚幻的泰初之境了。写《远游》的时候屈原尚未完全决定主意，他有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从神仙到泰初都是屈原的中间过程，回到现实才是他最后的归宿。所以如果只选取一篇诗作为屈原的代表作，那当然是《离骚》而不是《远游》——有一些现代学者甚至干脆认为《远游》并不是屈原的作品。否认《远游》乃屈原的作品毫无坚实的依据。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境遇，就希望在想象的世界中获得，一度这样想过来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事情。古人迷信，相信有美好的神仙世界，于是希望到那里去游历一番并在作品中展开想象，或者只是借神仙世界来曲折地抒情达意，这就是所谓“游仙诗”《远游》正可以说是有最早的一首游仙诗。

中国古人神仙观念的来源比较复杂，一是“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

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古代又有一批自称能沟通人、神的专家，他们是那时的神职人员，总称为“巫”，有男有女，水平高低不等，最高级的可以充当国师。在屈原本人以及同他有关的作品中出现过若干这样的专家，如灵氛、巫咸（见《离骚》）、太卜詹尹（见《卜居》）等等。当时这样的巫师各地皆有，楚国尤盛，因为这里文献以后是另寻泰初无为之地来安顿自己，这其实还是一种空想。后来到《离骚》里屈原才明确地说只有在楚国实现“美政”的理想才是他念念不忘的根本心事，于是就不谈什么虚幻的泰初之境了。写《远游》的时候屈原尚未完全决定主意，他有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从神仙到泰初都是屈原的中间过程，回到现实才是他最后的归宿。所以如果只选取一篇诗作为屈原的代表作，那当然是《离骚》而不是《远游》——有一些现代学者甚至干脆认为《远游》并不是屈原的作品。否认《远游》乃屈原的作品毫无坚实的依据。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境遇，就希望在想象的世界中获得，一度这样想过来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事情。古人迷信，相信有美好的神仙世界，于是希望到那里去游历一番并在作品中展开想象，或者只是借神仙世界来曲折地抒情达意，这就是所谓“游仙诗”《远游》正可以说是有最早的一首游仙诗。

当时的神仙观念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来源，这就是北方燕、齐两国鉴于海上的见闻而产生的遐想，那里的人们相信海上有三神山，有不死之药，后来迷信方术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安排队伍前去搜寻。屈原出使过齐国，熟知海外神山以及种种神话，对于在中原流行的各路仙人也都了解，在《远游》中提到过一些，如王子乔、赤松子等等。屈原提到的韩终原是齐国的方士，“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这些中原神仙后来在刘向的专著《列仙传》中每有介绍。楚国盛产的巫与中原文化中的仙，屈原在诗中兼收并蓄，遂成大观。

在《庄子》中也说起神仙，如藐姑射山的神人（《逍遙游》）、“乘云气，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至人”（《齐物论》），原来也许只是庄子的寓言，但后来也成了神仙世界中的人物。老子《道德经》富于哲理性，他大讲“无为而无不为”，讲古老的理想世界的“泰初”，这一方面的思想材料，更能得到屈原的青睐。

只要是同污浊的现实社会对立的地方，屈原都打算去游历一番，在那里安身立命。作为一位在当下政治生活中屡次碰钉子遭受诬陷的高官，他有这样的奇思妙想是可以理解的，同《离骚》也正可以对观参照，互为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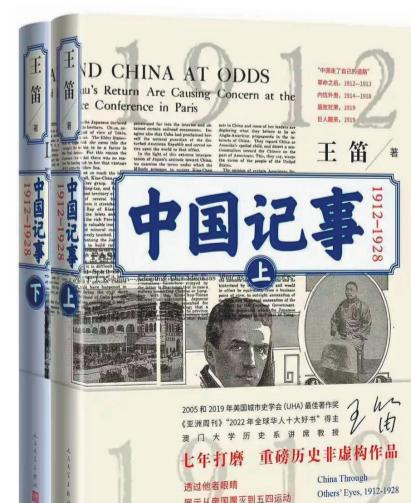
《远游》中有些字句与《离骚》相同或相近，这一点曾经被作为《远游》非屈原作的根据，其实屈原诗中的字句前后略有重复的地方，是并不奇怪的，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其间思想的发展变迁。刘向、班固、王逸这些最早研究屈原的汉代专家一致指出《远游》是屈原的作品，而有些现当代学者在两千年后忽然否认此事，未免疑古过甚，没有坚实的根据。

深描与壮歌：全景再现20世纪初的激荡岁月

孟育芬

■ 提示

十五载匠心淬炼，七载笔底波澜，王笛以《中国记事（1912—1928）》书写20世纪初中华民族自强奋进的历史。在坚实的学术基石之上，展现出非虚构写作的艺术魅力，实现了历史书写严谨性、细节感染力与大众可读性的统一。全景式再现了那个风雷激荡、民族精神昂扬的年代。



2025年4月，历史学家王笛沉潜15年研究，精心笔耕七载的非虚构巨著《中国记事（1912—1928）》（以下简称《中国记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

活力的20世纪初年图景。王笛教授为这段历史研究树立了新的史料学术范式，将严谨性、感染力与可读性实现完美融合。王笛考据精微，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叙述，如燕京大学的创办历程、五卅运动的组织与发展、北伐战争的民心所向，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互证基础上，逻辑链条清晰，结论审慎有力。

书中充满打动人心的微观叙事；描绘燕京大学学子在简陋校舍中挑灯夜读，心中揣揣“教育救国”的理想；刻画五卅运动中，青年学生不畏强暴、组织有序地走上街头，以青春热血唤醒国民意识；记录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工人们在夜校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眼中闪烁对未来的希望。这些源于一手史料的细节，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概念，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体验。

全书结构设计精巧，以清晰的脉络串联起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既宏大开阔又条理分明。王笛的文字饱含深情且极具画面感：“燕园春深，未名湖畔书声琅琅，一代青年于此汲取新知，锻造脊梁；浦江潮涌，五卅街头呐喊震天，青春热血化为民族觉醒的惊雷。”“北伐军行经之处，乡民箪食壶浆，那朴实的笑脸与期盼的眼神，是对国家统一最深沉、最直接的呼唤。”这种兼具史料厚重与文学灵动的笔法，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

图像叙事与文字描述相得益彰，书中精选的数十幅珍贵历史图片，如燕京大学早期校园风貌、青年学生社团活动留影、反映基层社会变迁的照片，非点缀之物，而是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无声地诉说着历史，为文字叙述提供了直观有力的佐证，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

《中国记事》的核心主旨是浓墨重彩

地书写中华民族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迸发出的自强不息、追求进步、走向统一的伟大精神。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新式教育机构，抒写教育兴国的华章，克服重重困难，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的人才，成为“教育救国”理想的生动实践，是民族未来希望的摇篮。

全书谱写了青年觉醒的壮歌，五卅运动是本书着力描写的高光篇章。它展现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如何从书斋走向社会，以高度的组织性、爱国热忱和社会责任感，成为推动国民革命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力量，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青春史诗。书中对社会主义思想等新思潮在中国传播的细致描摹，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寻求变革、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开放心态与积极实践，这是民族精神中求新求变、追求光明的重要体现。书中通过对北伐战争进程中民心所向的刻画，彰显了人民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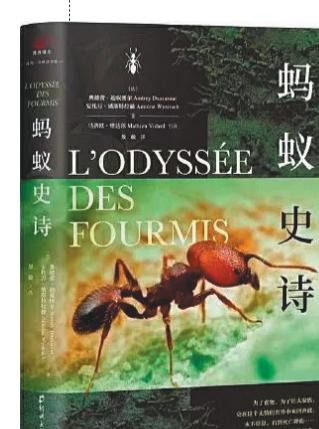
王笛教授以饱含敬意的笔触，将这段历史中知识青年与普通民众所展现的主动性、创造力、牺牲精神和对国家民族前程的深切关怀置于舞台中央，奏响了一曲深沉而激昂的民族自强奋进之歌。这种对历史主体性的强调和对民族精神正面价值的弘扬，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

《中国记事》完美地架设了一座沟通精深学术与大众阅读的坚实桥梁。得益于王笛流畅优美的文笔、跌宕起伏的叙事、感人至深的细节和清晰有力的主线，使读者能沉浸其中，轻松把握历史脉络，感受时代精神，获得知识的启迪与情感的共鸣，成功地将一段复杂的历史，转化为一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现代中国关键年代的扎实读本。



《竹影鲸歌：
杜甫的意象世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

致力于显发杜甫生命与艺术成就的标志性意象，如竹、花、月、鸥鸟、大鲸、鹭鸟等，欧丽娟教授吸收传统中的灼然慧见，将杜诗意象纳入《诗经》以来的整个诗史发展脉络中观察，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观察分析的眼光，具体而微地理解杜甫何以为诗圣。



《蚂蚁史诗》
郑州大学出版社

此书是向那些勇敢的蚂蚁致敬：它们为了族群的生存毫不犹豫地挑战一切危险，直至生命的尽头。蚂蚁每次离开巢穴，踏上新的旅程都可能是一条永无归途的远征之路。这是一本科普作品，两位作者都是科研工作者，书中所有内容都源自科学实践，源自科学家们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心设计的科学实验。



在本书中，我们将穿越文化史上的璀璨时刻，见证人类在拓展生存空间和发现自我时的巨大成就。每一个故事都凝聚着文化创新、冲突、遗忘与重生中的智慧结晶，涵盖古今，扣人心弦。马丁·普拉纳的这部作品，是记录文明发展重大时刻的档案，更是我们人类作为创造性物种留给未来的指南。



云中谁寄锦书来

李海卉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慢》是作家、画家木心在旅途中所创作的一首现代诗，发表于2009年木心诗歌集《云雀叫了一整天》中。近日，翻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部书信集《他们给我写过信》《陈翰笙书信集》，感受到了这种旧日情怀的珍贵。泛黄信笺上，张允和的簪花小楷与陈翰笙的挺拔笔迹相对而立，一为文人雅士的墨戏清谈，一为革命学者的铮铮风骨，共同拼贴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采。当指尖拂过这些纸页，触碰的不仅是墨痕，更是一个时代的心跳与体温。

张昌华珍藏了两千余封书信，每位执笔者的性情在纸张自然流淌，毫无遮掩；张允和与陈翰笙对话时，笔锋犀利如刀：“胡适虽不是书家，但自有他潇洒风格。作伪者隔纸指出，笔笔迟滞，笔无轻重，处处怕错的心理，活现纸上。”寥寥数语，艺术鉴赏家的眼力凛然可见。更动人的是她将胡适丢弃的诗稿残篇赠予张昌华时附的跋语：“这残篇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适之先生在我家中写的，因墨污所以丢在废纸篓中……今赐赠昌华，聊胜于伪。”文人间的情谊与幽默尽在其中。

陈翰笙的书信则彰显革命学者的铮铮风骨。82岁接手《外国历史小丛书》主编时，他近乎失明却坚持审阅296部书稿。

钱锺书、杨绛夫妇的贺年卡则是另一种风景：湖蓝卡纸潜印鱼鳞暗纹，仅书“新禧 钱锺书杨绛同贺”九字。张昌华揭秘道：“字是钱先生所写，受者名由杨绛填写”。百岁杨绛致信时更显顽皮：“你写的字真美，我会当墨宝珍藏。你寄的花笺，我就贪污了，行吧？反正我已逾百岁，老面皮了！”这份童真般的直率，恰是书信方能留存的鲜活表情。

书信的私密性让学者卸下铠甲。张允和给张昌华的信末打趣：“不打你，你是张家的好孩子，奶奶舍不得打你”，长辈的慈爱跃然纸上。艺术家吕恩坚持要张昌华改称大姐：“你素称我为大姐，为什么要叫我先生？就叫我一声大姐吧！”这种亲昵的嗔怪在正式文稿中很难见得。陈翰笙晚年致友人函中，那些关于青光眼、白内障的调侃：“我现在是‘一清二白’，多么光彩呀！”以及“我像一部汽车，发动机是好的，虽然两个车灯不亮了”的幽默自嘲，让这位跨越三个世纪的革命学者，在褪去历史光环后显露出可爱本真。这些信纸像时间的棱镜，把大人物折射成有温度、会微笑的真人。张昌华先生说得妙：“收藏书信是收藏故事，更是收藏故事里活生生的人。”

《陈翰笙书信集》中那些附有原件影印的书信，让我们目睹了物质性笔迹的消亡危机，电子邮件中的字体，永远不会有这般生命质感。聂华苓在信中对张昌华坦白：“她近九十了，不能开车到镇上寄信，改用电邮”。张昌华自嘲为“时代落伍者”，却发明了独特的抵抗方式——在纸上写信，手机翻拍后电邮发送，谓之“土洋结合”。这些纸页不仅是怀旧的容器，更是对抗历史记忆的堡垒。

“见字如晤”四字，道尽书信的魂魄所在。百岁老人陈翰笙的书信穿越80年风雨抵达我们手中，纸页上的钢笔字迹仍带着书写时的力度。这些信纸承载的不仅是个体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那些花笺上的墨痕、八行笺上的叮嘱，依然安静地证明：有些温度，只有笔尖能够传递；有些永恒，唯有慢才能抵达。